

瓮安6年间从“大乱”到“大治”，靠的是法治 法治社会是依法治国的基石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2日电(记者邹伟 罗沙 白阳)天下大治,是每个人心中的社会理想,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价值目标。

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把法治中国建设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会议将对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作出全面部署。

培育法治信仰

“营造‘全民信法、全民守法’的社会氛围,需要引导公民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养成遵纪守法和用法律途径来解决问题的良好习惯,真正使法治精神深入人心。”

2014年8月,重庆巴南区。因为一起林权纠纷,农民李世荣一纸诉状将区政府告上了法院。出乎意料的是,开庭当天,坐在被告席上应诉的是区长陈刚本人。

“我对群众用法律而不是上访的方式维权表示感谢。”在庭审最后陈述阶段,陈刚由衷感言,“这是群众民主法治意识增强的结果,也给我们政府公务人员敲响了依法行政的警钟。”

宪法和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习近平总书记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指出:“只有保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尊重和保障人权,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宪法才能深入人心,走入人民群众,宪法实施才能真正成为全体人民的自觉行动。”

宪法和法律的实施,源自全社会对法律的信仰。“营造‘全民信法、全民守法’的社会氛围,需要引导公民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养成遵纪守法和用法律途径来解决问题的良好习惯,真正使法治精神深入人心。”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王利明说。

今天,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命题,将法治社会建设推向一个新的境界。

从废止劳教制度、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到全面推进审判流程公开、健全错案防止纠正和责任追究机制……一系列改革举措,为法治社会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司法公正正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培育法治信仰的重要保障。

今年以来,上海、广东、吉林、湖北、海南、青海,6个省市司法体制改革先行试点,渐次推开。

完善司法责任制,既赋予法官、检察官相应的职权,又落实法官、检察官的办案责任,强化监督制约。推行主审法官责任制、合议庭办案责任制、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打破层层审批的行政化做法,“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加大司法公开力度,生效裁判文书上网公开,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按照司法职业特点,让法官检察官、司法辅助人员和司法行政人员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创新治理之道

“通过法治确保社会自治,通过法律对公权力的约束,保障社会自我调节的功能空间,确保社会自治得以有效进行。”

金秋,全国山地户外运动锦标赛在贵州省瓮安县落幕。来自各地的选手和观众实地感受到了瓮安政安人和的新气象。

6年前,一把大火烧向县委大楼,“瓮安事件”震惊全国。6年过去了,瓮安群众对干部作风的满意率从不足30%升至85%以上,群众安全感超过95%,对执法

机关的满意率跃升至全省首位。对此,当地干部群众深有体会:从“大乱”到“大治”,瓮安靠的是法治。

和谐社会,本质上就是法治社会。法治社会是构筑法治中国的基石,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核心内容。当前,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攻坚期、深水区,各种新的社会矛盾、利益冲突凸显。社会治理思路如何及时做出调整,成为新时期法治社会建设的一个关键问题。

“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这是中国共产党的郑重宣示。

建设法治社会,必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有序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使人民群众共享法治社会建设成果——

相对于国家和政府而言,社会带有一定的自治属性。而在现代国家中,法治作为最基本、最核心的秩序体系,是社会有序自治的根基所在。

“通过法治确保社会自治,通过法律对公权力的约束,保障社会自我调节的功能空间,确保社会自治得以有效进行。”王利明说。

专家指出,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推进基层群众

依法自治,充分发挥社会自治规范的积极作用。

法治德治交融

法律和道德都是社会行为规范,而最高境界的守法是恪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最低限度的守法是做到法律的底线不能逾越、道德的红线不能触碰。

从今年开始,山东省荣成市每个市民和企业都有了一张“诚信身份证”,汇集违法违规、荣誉奖励等多方面信息,划分不同信用等级,与招工招考、金融信贷、创业扶持挂钩。一段时间以来,当地一些领域的社会风气有了明显改观。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朱景文认为,在强调法治重要性的同时,必须注意其他手段,如道德、习惯、社会规范等的重要性。

社会需要法治,首先需要规范。走向法治社会,必须从建立规则入手。

多位专家表示,法律和道德都是社会行为规范,而最高境界的守法是恪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最低限度的守法是做到法律的底线不能逾越、道德的红线不能触碰,法律的义务不能抛弃,道德的责任不能丢失。

湖南一在押人员 进看守所三天猝死 初步排除自杀、他杀可能

新华社长沙10月22日电(记者谢樱)近日,有网友发帖称,湖南新宁县看守所押人牛华军入所后不到三天离奇猝死。记者22日从湖南省新宁县县委政法委了解到,新宁县目前正在组织调查牛华军死亡事件,初步排除了牛华军自杀、他杀可能,待调查清楚后,会及时向社会公布调查处理结果。

据了解,今年6月28日至6月30日,新宁县金石镇无业人员牛华军伙同他人在金石镇境内多地开设赌场,组织人员参与赌博,并从中抽头渔利。8月20日,牛华军被新宁县人民检察院以开设赌场罪批准逮捕。10月12日,牛华军被新宁县公安局抓获归案,经体检后,被送至新宁县看守所羁押。

10月13日、10月14日,新宁县公安局和检察院先后对其进行询问调查,均未发现牛华军有异常情况。10月15日早晨6时29分,监区长肖某某叫牛华军起床没有回应后,发现其呼吸微弱,便敲响警铃示警,并打通120急救电话,组织人员将其抬出监室,急送医院进行抢救。7时50分,牛华军经抢救无效死亡。

事发后,由新宁县委相关部门成立了调查组,针对牛华军的死亡原因展开调查。目前初步排除牛华军自杀死亡和其他外部原因作用于人体造成死亡的情形,但其具体死亡原因尚待法医鉴定结论。

台湾成立“食安办” 加强食品安全管理

新华社台北10月22日电(记者韩森 陈健兴)一年多来,台湾食品安全案件频发,受到各界高度关切。22日,台行政管理机构下设“食品安全办公室”(以下简称食安办)正式挂牌成立。

台行政管理机构发言人孙立群早前表示,为统筹规划食品安全政策,协调各权责机关预防及处理重大食品安全事件,台行政管理机构将原“食品安全推动工作小组”转型扩大为“食品安全办公室”。食安办系常设性编制,负责督导协调、统筹推进跨部门食品安全管理工作,下设管理协调组、应变沟通组、稽查取缔组、资讯服务组等,专职人员20名,成员中包括台行政管理机构人员与行政管理机构下辖内部事务主管部门、财政主管部门、经济主管部门、卫生福利主管部门、法务主管部门与农业主管部门人员等。

台新任卫生福利主管部门负责人蒋丙煌将负责督导食安办。他表示,食安办就像整个食安工作的参谋总部,负责统筹、协调、指挥,以期防范于未然,使民众的食品安全更有保障。

9月以来,台湾接连曝出以“馊水油”“饲料油”混充食用油等重大案件,引发民众强烈不满。

太原连日“雾霾侵城”



10月22日,太原市民戴口罩出行。当日,山西省太原市被灰色雾霾所笼罩,空气质量为重度污染。自19日起,太原市区出现持续雾霾天气,由于近天气温较稳定,风力较小,空气中的颗粒物和污染物无法扩散,因此加重了雾霾的形成。据气象部门预测,本轮雾霾天气将持续至25日。(新华社发)

今日霜降防咳护胃

据新华社天津10月22日电(记者周润健 朱天骄)“寒露不算冷,霜降变了天。”《中国天文年历》显示,北京时间10月23日19时57分迎来今年秋季最后一个节气霜降。专家表示,此时正值节气过渡之际,天气开始转凉,气候日趋干燥,公众要注意添衣保暖,加强防护。

气象资料显示,霜降节气已是深秋时节,也是冷空气活动频繁的时期,天气变化剧烈。中央气象台22日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较强冷空气将继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气温下降4摄氏度—6摄氏度。

秋冬过渡之际,防病保健很重要。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营养科主任李艳玲表示,此时节,公众要注意保暖,加强锻炼,防止感冒。

她提示说,霜降前后是易犯咳嗽的季节,也是慢性支气管炎易复发或加重的时期。因此,在这个季节应多吃一些具有生津润燥、消食止渴、清热化痰、固肾润肺功效的食物,如梨、苹果、洋葱、萝卜等。

十三万「协调机构」 全国各地一次性砍掉 西瓜办、馒头办、生猪办……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2日电(记者周琳 朱翊)命名五花八门——领导小组、协调小组、委员会、指挥部、办公室;时间自主掌控——常设型、阶段型、临时型;涵盖行业广泛——足疗保健、铲除豚草、西瓜办、馒头办、生猪办……

地方层面到底有多少个领导小组和议事协调机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来,全国一次性减少13万余个。面对重要棘手的临时性任务或突发事件,工作难以分解到单一机构,需要更高级别的领导“挂帅协调”、联合攻关,这本是提高行政效率的做法。可近年来,各种领导小组“扎堆”,着实成为公共行政管理的头疼事。

协调办公室、指挥部、委员会……这些机构名目繁多,涉及行业五花八门:陕西省某市多年前甚至曾成立“推广足疗保健工作领导小组”,在成立之初就广受争议,最终销声匿迹。更别说是曾引发讨论热潮的馒头办、西瓜办、“禁止午间饮酒办公室”,“奇葩”频现。

遇事先开会,开会先成立“小组”。业内人士介绍,领导小组的设置,地方政府掌握的灵活性更大,甚至有时只需发个通知就可成立,在一些突发性事件上,几乎成为应急的“万能钥匙”。

一些领导小组为了指向“明确”、功能“精准”,命名长也成常见现象,部分长达几十字的机构甚至被网友吐槽“章都刻不下”。例如,“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巴东县神农溪旅游景区国家5A级新旅游项目开发区景区管理委员会综合治理委员会景区及周边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全称超过60个字。

其针对性的清理已非首次。安徽亳州早年就一次性撤销109个市级“领导小组”,被称为挖掉“文山”之根,截断“会海”之源,可是近年来一些新的领导小组又“雨后春笋”般重来。

各类“领导小组”,动辄是市长、副市长等领导亲自挂帅,担任组长或副组长。2012年,山东滨州曾一口气公布了19个议事协调机构的领导名单,涉及节能减排、国土建设多个行业,可“一把手”都是当地市委主要领导。这还是最忙的,2009年,东部省份一位县委书记被安排担任近40个领导小组的组长。

“一些地方政府,对自身到底设了多少个领导小组说不清楚。”南开大学讲师周望说,实际上许多领导小组是“纸上机构”。从发文件成立,到发文件撤销,其间可能从未正式“领导”或“协调”过。

随着一系列简政放权政策的展开,地方层面“领导小组”乱象得到了初步整治。但“割肉式”治理难以完全挤出水分,还需要从“法治”入手,专家认为,“机构法定”是原则,亟须出台相关规定,避免设置“随意化”。



重庆小学生习武健身

“一人当官全家发财”的“亲缘腐败”将难以遁形 中央亮剑官员亲属违规经商



刘铁男(资料照片)

刘铁男与刘德成父子的权利勾结属于“借壳捞钱型”。根据检方的起诉书,刘铁男帮助南山集团解决3万吨氧化铝购销合同,南山集团董事长将购销差价中的750万元人民币汇入刘德成控制的公司;刘铁男帮助张爱彬在北京成立广汽丰田汽车销售店,张爱彬将新公司30%股份送给刘德成,之后又用1000万元人民币回购股份。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2日电(记者秦交锋 翟永冠)近日陆续公布的2014年中央巡视组第一轮巡视整改情况通报显示,14个被巡视的对象中有7个地方和单位出现干部亲属子女违规经商办企业问题。

“半数被巡视对象暴露出领导干部用权力为亲属、子女谋利的问题,这样的结果令人震惊。”反腐问题专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任建明说。

专家称,从1979年至今,共有100余项法律法规及政策涉及干部亲属子女违规经商问题,但一直以来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中央巡视组聚焦干部亲属子女违规经商,意味着将干部亲属等“易腐人群”纳入反腐视野。那种“一人当官全家发财”的“亲缘腐败”将难以遁形。

亲属违规经商多发

近期,2014年中央巡视组第一

轮巡视陆续公开巡视整改情况。在14个被巡视省市和单位中,有7个地区、单位存在干部亲属子女违规经商办企业现象,个别地方问题突出。

山东省存在“领导干部及其亲属插手工程招标、土地转让问题”,宁夏存在“一些领导干部及其亲属违规在其管辖范围内经商办企业,从事房地产开发、建筑安装、园林绿化等”问题,河南省“市主要负责亲属子女经商办企业”,新疆“领导干部亲属利用其职权和职务影响谋取不正当利益”。

那么,子女亲属违规经商与领导干部发生腐败到底有多大关联性?在新疆的专项清理中,近1000条违规的线索目前已经查出输送利益、谋取不正当利益的问题线索68件;江西专项清理期间,各地各部门通过自查发现涉及利益冲突方面的问题2000余个,立案查处的已有110余人。数据说明,子女违规经商办企业与领导

干部腐败的“关联度”相当高。据披露,今年以来新疆共立案查处此类案件176件,占15.6%,其中自治区纪委查办的16件违纪案件中,有6件涉及此类问题,占比高达37.5%。广东省纪委通报,今年上半年立案查处的要案有31件是官员利用影响力为亲属、子女谋利,占要案总数的33.3%。

“官商钱利益互惠型”。家庭成员有人当官,有人经商,“权为商开路,商为权巩固”。在山西运城的“房媳”事件中,以“房媳”张彦、公公孙太平为核心的运城孙家是典型的家族内“官商合作”,该家族成员多人在运城担任公职,分布在公、检、法、纪委以及政府各职能部门,同时家族还经营着物流公司、洗煤厂等企业。

“借壳捞钱型”。一些干部子女经商办企业并不从事实际业务,其公司只是进行贪污受贿的“壳”。今年2月,江西纪检部门对副厅级干部张某某立案调查,目前张某某已被移送检察机关立案侦查。据办案人员透露,为了牟取不正当利益,张某某在其任职所在地开办了一家财务咨询公司,每年象征性地到当地私营企业翻翻账本,一家公司就可拿到15万元的咨询费。

刘铁男与刘德成父子也具有同样的特征。根据检方的起诉书,刘铁男帮助南山集团解决3万吨氧化铝购销合同,南山集团董事长将购销差价中的750万元人民币汇入刘德成控制的公司;刘铁男帮助张爱彬在北京成立广汽丰田汽车销售店,张爱彬将新公司30%股份送给刘德成,之后又用1000万元人民币回

购股份。

——“利益集团交换型”。这种腐败形式一般是领导干部先施惠于下级、商人,再打招呼让其“照顾”自己的亲属,或者官员之间达成某种“默契”,以手中权力为交换筹码,异地“交易”利益互换。中央编译局博士后吴晓林介绍,这种算是家族内“官商结合”的“高级形式”,难以发现、查处,并且大都是“窝案”的形式暴露,负面影响也更大。

另外,领导干部子女违规经商办企业的“国际化”趋势明显,这也大大增加了腐败的隐蔽性。江苏一位纪检人员介绍,无锡一位副厅级干部的儿子在香港开公司,形成了“老子在国内给人办事,儿子在境外大肆收钱”的腐败链条,短短几年时间,这个“官二代”在境外收受贿款上千万元。

“还需制度落地生根

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蔡志强说,此次巡视意味着领导“身边人”等靠近权力的“易腐人群”,已经被纳入反腐视野,“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正在加速落实”。

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谢世诚认为,监管边界、标准模糊以及约束机制不细化、缺乏操作性,是造成法规难以落地的主要原因。

一位纪检干部举例说,如对于“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不能在该领导管辖的业务范围内从事可能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经商办企业活动”的规定,在实际监督中如何界定“领导管辖的业务范围”“与公共利益冲突”两个问题,就存在操作难题。

“中央巡视组将相关问题‘揭开盖子’,表明了中央将坚决查处相关问题的态度。”任建明说,“需要关注的是,领导干部可以用党纪国法来规范,其亲属子女出现违规应该如何处理?这些都需要在今后进一步明确。”